

盛唐

王小甫主编

时代与 东北亚政局

SHENGTANG SHIDAI YU DONGBEIYA ZHENGJU

北京大学
盛唐研究
丛书

BEIJING DAXUE
SHENGTANG
YANJIU
CONGSHU



上海辞书出版社

盛唐

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北京大学
盛唐研究
丛书

BEIJING DAXUE
SHENG TANG YANJIU
CONG SHU
SHENG TANG
SHI DAI YU
DONG BEI YA
ZHENG JU



王小甫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小甫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8

(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

ISBN 7-5326-1280-5

I. 盛... II. 王...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东亚—
唐代 IV. D82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807 号

责任编辑 王圣良

装帧设计 姜 明

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李伟国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江杨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 插页 5 字数 472 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7-5326-1280-5/K·212

定价: 45.00 元

本课题的研究
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基金资助

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

总序

盛唐，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辉煌壮丽的时代。盛唐为何兴盛？盛唐的兴盛局面表现在哪些方面？盛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如何？盛唐的辉煌对后世有何深远的影响？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在唐代的研究方面曾经取得过卓越的成就，如向达、汪篯、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张广达、吴宗国等先生，都作出了富有开拓意义的贡献，目前也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角度从事唐代的政治、法律、地理、经济、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这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我们邀请了一批校内外、海内外在唐代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共同来参与实施“盛唐研究计划”，共同探讨这一伟大的时代，把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展现给世人，把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并希望在取得学术研究的进展的同时，也通过对盛唐经验教训的总结，给我们今天提供一些教益和启迪。

现在，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盛唐研究计划”的第一批成果，即吴宗国教授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李孝聪教授主编的《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王小甫教授主编的《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邓小南教授



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册)、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共计五种六册,作为《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第一辑,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隆重推出。

这一批集体研究成果,从政治制度之整合、国际关系之协调、国家运作之效率、社会风貌之丰富多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并对盛唐缘何而盛给予了有力的说明,在一些国内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如女性与社会、宗教信仰与社会、地域与空间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综合性的研究和总结。

我们希望以此为肇端,把《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继续编纂出版下去。

这项研究计划从启动到第一批研究成果出版,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谨代表本《丛书》的各位主编,向提供大作的各位学者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学术贡献,也就没有这项集体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我们也特别要感谢北京大学领导以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系的领导从道义到资金上的指导和大力支持,没有他们对这项研究计划的关怀和支持,我们也无法完成这项事业;我们还要感谢随叫随到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们,他们在学术上和事务上所提供的无偿劳动,不仅使我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深受国内外学者称道,而且使我们的《丛书》编辑工作的质量得到切实的保证;最后,我们向我国最大的工具书出版基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李伟国社长和历史地理编辑室的许仲毅、余岚、张敏、王圣良、解永健等各位责任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不计成本,以推动学术研究、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是他们,最后以辛勤的劳动,把这套《丛书》奉献给了读者。

荣新江

2003年2月14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录

第一编 政治史

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	王小甫 (3)
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	
——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	王小甫 (34)
隋、唐两代伐高句丽比较研究·····	于赓哲 (54)
从平百济之役看唐初海军·····	熊义民 (79)
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	李松涛 (94)
试论安史乱前幽州防御形势的改变·····	李松涛 (116)

第二编 民族史

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

——以朝阳隋唐墓研究为中心·····	齐东方 (133)
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	杨晓燕 (161)
靺鞨族属及渤海建国前的靺鞨与周边关系·····	范恩实 (251)
白山靺鞨史考·····	范恩实 (268)
渤海国的建立及其与周边政治关系·····	范恩实 (286)
石敬瑭割让燕云(幽蓟)的历史背景·····	范恩实 (306)

第三编 关系史

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

——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	王小甫 (326)
------------------------	-----------

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	王小甫	(343)
围绕着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唐日外交·····	熊义民	(355)
唐朝之东北亚诸国观及东北亚诸藩国国际地位		
——以唐代各国争长事件为中心·····	福田忠之	(372)
“黑貂之路”质疑		
——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	王小甫	(407)

第四编 田野考古

隋唐五代燕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分布

——2000年7月赴河北、内蒙古、辽宁田野考察的

初步报告·····	王小甫	(426)
2001年秋季华北考察简报·····	王小甫	(439)

附录一：朝鲜为“来朝之韩”说·····	王小甫	(444)
---------------------	-----	-------

附录二：近二十年国内外靺鞨史研究评述(附论著目录)·····	范恩实	(455)
--------------------------------	-----	-------

附录三：隋唐五代东北亚关系史大事年表·····	范恩实	(487)
-------------------------	-----	-------

附图一：2000年暑期考察资料图片集·····	王小甫	(520)
-------------------------	-----	-------

附图二：2001年秋季考察资料图片集·····	王小甫	(529)
-------------------------	-----	-------

第一编 政治史

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唐书》四夷传总序曾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①。唐代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契丹、奚、室韦、黑水靺鞨、渤海等，在《新唐书》里被列为《北狄传》。可是，在上述四夷传总序里，北狄各族一个也没有提到，似乎“把奚、契丹看得比所谓东夷、西域都更不重要”^②。《新唐书》列传的作者宋祁是北宋人，北宋王朝长久处于契丹辽朝的压力之下，当时史家却如此看待唐代北狄诸族的历史地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唐朝统治者及时采取措施，建立河北藩镇，则五代北宋时那么严重的东北边患很有可能提前在中唐时就出现。”^③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吗？这些都是历史工作者所碰到的饶有兴味的问题。

其实，宋祁在《新唐书》四夷传总序里不提契丹等族的原因，未必是因为“对唐代奚、契丹的情况尚如此隔膜”^④。诚如史家陈寅恪先生所归纳：“宋子京作唐书四夷传，其叙述次第一以盛衰先后，二迹用兵之轻重，三记唐所由亡。”^⑤而契丹勃兴却是一个长达五百年的历史过程，其在唐代的活动与其强邻的兴衰密切相关^⑥，正式建国更在唐亡以后，这些情况显然不是《新唐书》四夷传总序的主旨所能涵盖的。加之李唐皇室奉行一贯之“关中本位政策”，西北在其战略中优于东北^⑦，这恐怕也是《新唐



书》四夷传总序未能突出北狄一系的客观原因。唐代中国国势繁盛，与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接触颇多，“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⑧。因此，单讲北狄、契丹的活动也不可能完全揭示唐代及后世东北边患产生和加剧的历史根源。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⑨我们注意到，被《新唐书》四夷传总序所忽略的所谓“北狄”诸族，正好就是唐以后历代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的先民：契丹（辽朝），室韦——蒙古（元朝），黑水靺鞨——女真（金朝）、满族（清朝）。换言之，唐代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了唐以后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隋唐时代的东北地区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其间关系如何？又怎样影响到地区政治格局和社会的演变？这些就成了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除了当地民族自身的发展之外，影响东北地区政治形势和社会变化方向的并不只是唐朝的东北消极政策，还有周边民族与国家的盛衰离合。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空间关照范围，不仅大陆及其滨海沿岸地区，也应包括地缘和历史上海密切相关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我们的计划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本书是其初步成果之一^⑩。本文作为全书总论，以下拟就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看法，以明全书旨趣。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尚德抑武与新罗拉动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民族的关系,经常被用各种“体制”、“体系”、“秩序”,甚至“圈”来加以描述^①。这些说法,由于所用概念本身的含义,多半都带有中心与边缘关系的特点。加上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传统的大国地位,更加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甚而以为被描述成“体制”、“体系”等等的这些关系状态,都是历史上中国人主动追求的目标或积极经营的结果。我认为,这方面恐怕有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历史上中国人对自己与周边关系的描述,如“五服”^②、“九服”、“入蕃”^③、“绝域”之类,只是当时人对自己所处世界一种认识的反映,所用概念都只是整理自己知识的手段,并非是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或要努力完成的任务。况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历史上的国家及民族关系发展也不是完全由中国人的主观意愿来安排进行的。然而,由于受成见的影响,在东北亚地区政治关系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却形成了片面强调隋唐统一对周边形成威慑的倾向,很少注意周边国家及民族自身的主动性,我想这是首先应该予以廓清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与周边国家及民族关系时具备特有的尚德抑武、以德服人观点,如“舜舞干戚,荒服来王”、“舜歌南风,天下大治”^④之类,这一点在隋唐时代也不例外。翻开记述唐朝初年太宗君臣论治的《贞观政要》,官僚士大夫反对战争、反对拓土开边的言论比比皆是^⑤。如贞观四年(630)唐灭北突厥后又遣使招慰西突厥,负责招抚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略云:“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



备矣。”^{①⑥}所谓“近观隋室”，即唐初修《隋书》所集中总结的隋亡教训，如其《东夷传》史臣曰引《兵志》：“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①⑦}。贞观十四年平麴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太宗欲以其地为郡县，侍中魏徵、黄门侍郎褚遂良均反对，后者上疏略云：“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返；始皇远塞，中国分离。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①⑧}至于唐太宗征伐高丽，更在朝廷内外遭到普遍反对，只有兵部尚书李勣主张讨伐^{①⑨}。

或许有人以为这是唐初继亡隋之后特殊的社会思想状况，其实不然。即使到了盛唐时期，这类思想及议论仍然随处可见。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减少远戍，屯田防边，多建友邦可说是武后得势初期的主要外务策略。三者相辅相成，并不彼此矛盾，但基调可同说是以和为贵。探讨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也应当从这方面去参考比较。”^{②①}而到了武周中期，神功元年（697）刚刚拜相的狄仁杰就上疏《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其文略云：“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业也。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则恒、代之镇重，而边州之备实矣。况绥抚夷狄，盖防其越逸，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计校长短哉！”^{②②}

史称“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房、杜为辅佐太宗成“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宋即辅佐玄宗创盛唐“开元之治”的姚崇、宋璟，而史载“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②③}。开元四年（716）突厥内乱，安西副大都护郭虔瓘建议募关中兵往西域讨击余寇，将作大匠韦湊上疏谏曰：“上古之时，大同之化，不独子子，不独亲亲，何隔华戎，务均安靖。洎皇道谢古，帝德惭皇，犹尚绥怀，不崇征伐，有占风觐雨之客，无越海逾山之师。其后汉武膺图，志恢土宇，西通绝域，北击匈奴。虽广获珍奇，多斩首级，而中国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号升平、君

称盛德者，咸指唐尧之代，不归汉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复焉足比议？”^{②③}

“安史之乱”以后时代进入中唐，这类议论仍史不绝书。如元和元年（806）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请击之，宰相杜佑上疏论之略云：

夫蛮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兴，猘狁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诚不欲弊中国而怒远夷也。秦平六国，恃其兵力，北筑长城，以拒匈奴，西逐诸羌，出于塞外。中国未静，白徒竞起，海内云扰，实生谪戍。汉武因文、景之富，命将兴师，遂至户口减半，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盖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蒸人，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岂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纳忠之臣，并有匡君之议。淮南王请息师于闽越，贾捐之愿弃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悬前史。国家自天后已来，突厥默啜兵强气勇，屡寇边城，为害颇甚。开元初，边将郝灵佺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代莫与二，坐望荣宠。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之盛，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此皆成败可证，鉴戒非远。^{②④}

白居易的讽喻诗《新丰折臂翁》，题下就注明“戒边功也”。诗中的老翁简直就是一个反战英雄，“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此始免征云南”。“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黠武。”笺校者引清乾隆御选《唐宋诗醇》认为此诗“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车》、前后《出塞》等篇”^{②⑤}。陈寅恪先生指出：“然君卿（杜佑）上疏，在乐天（白居易）作此诗之前。杜氏之疏传诵一时，白氏此诗以宋璟防黠武事为言，与之符同，或受其影响”；“后来微之（元稹）作连昌宫词，恐亦依约摹仿此篇，盖连昌宫词假宫边老人之言，以抒写开元天宝之治乱系于宰相之贤不肖及深戒用兵之意，实与此篇无不相同也。”^{②⑥}

由上述引证可以看出，贯穿有唐一代的这些议论例证大同小异，逻



辑理论相通一致,可见唐人的“尚德抑武”观点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现象或个人行为,而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和为贵、和平共存”思想的反映。这种观点值得系统整理,专门研究,以彰扬我民族和平主义的精神;促进新世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并有利于国际合作。而本文在这里揭示这些,只是希望能够变换一个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隋唐五代东北亚地区政治关系的性质。

其实,即如隋伐高句丽失败,也不尽因为“务广地者亡”。据史料记载:大业八年(612)隋炀帝亲征高句丽,“诸将之东下也,帝亲戒之曰:‘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辽东数出战不利,乃婴城固守,帝命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悟。既而城久不下”^②。可见炀帝以百万大军亲征高句丽而不能取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隋军受战略目标的限制而屡屡坐失战机。显然,隋炀帝作战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臣而不纳”,即并没有想彻底兼并高句丽。唐朝也是如此。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被阻于辽东安市城(今辽宁海城营城子),召诸将于驻蹕山问计,“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③。遂失战机,被迫班师。明年“车驾还京师。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蹕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④炀帝“不悟”,太宗“不忆”,其实都一样。显然,唐太宗也没有把彻底倾覆高句丽其国定为战略目标,他当年出兵的宣言便是明证:“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⑤。

然而,隋、唐两代毕竟曾经大肆征伐高句丽,而且唐朝最终和新罗一道将高句丽攻灭。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其间除了地缘政治的原因之

外^③，更重要的是新罗为了消灭竞争对手、实现半岛统一而对唐朝精心实施的战略拉动。我的较详细意见请读者参考本书所收的两篇拙文《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以及《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其实，隋、唐两代攻伐高句丽之所以有不同的下场和结局，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对高句丽的战争或许只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及民族的关系问题；从东北亚地区史的角度，就不能不看到新罗的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就不能不重视新罗的统一在东北亚政治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隋朝没有新罗的拉动，战略目标不明，因而不可能取胜。即使唐朝，也是在先出兵跨海帮助新罗消灭了百济、打败了倭军之后才最后和新罗一道解决了高句丽问题，而百济和倭国此前并未与唐朝发生地缘冲突。由此可见，唐初介入半岛事务，完全是顺应新罗的意愿。因而，高句丽最终被消灭，新罗对统一的追求不仅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是主要的原因。

总章元年(668)高句丽之灭标志着朝鲜半岛上统一新罗(668—935)的成立，这是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史中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二、唐代周边盛衰连环

如前所述，唐朝一贯奉行“关中本位政策”，那为什么唐初还能多次大规模出兵攻伐东北方面的高句丽呢？其原因在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629—846)当时还没有兴起成为唐朝的大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④；“高丽时代高宗获胜之重要原因在于乘高

